

東海文獻

漫談東海大學校徽與校旗

梁碧峯*

一、緣由

徽者，旌旗之屬也。校徽是學校辦學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藝術化體現，並反映著該校的開創精神、歷史傳統與文化累積。早期中華民國年代的學生都把佩戴校徽作為一種自覺的紀律，用以證明身份、規範行為、警覺行動，並以此為榮。

校徽(school badge)是一所學校徽章的簡稱，是一個學校的象徵標誌之一，其主要的目的是分辨人員、留存紀念和通過圖案、文字來介紹學校的特殊性質和專門學科，同時在佩戴校徽的時候也給佩戴者在無形中增加了紀律的約束，規範學生的行為，提高學校的知名度。體現出學校的特徵，讓人容易記憶。

校旗，泛指學校旗幟，上面通常標有學校名，是一所學校的象徵與標誌。學校旗通常涵蓋學校識別系統的基本元素：校名、校徽、標準字、標準色及創造圖案等。學校旗蘊涵學校的學術氣質，彰顯學校的文化理念，體現學校的精神風貌，展示學校的個性特色，對於一所學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沿革

本校自創校至民國四十五年二月中，對於象徵東海精神的校徽並未決定。當時，由教育部於民國四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來文 45(高)字第 1967 號，事由：令仰繪製該校校徽於本月底前呈部會送墨京國立大學展覽由。說明：准我國墨西哥大使館本年一月三十日大字第墨 1294 號代電：「頃准墨京國立大學函略稱近尼擬闢一陳列室展覽世界各國大學校徽特向本館徵索等由除函復外相應電請檢寄我國內各主要大學校徽圖樣並附說明以便轉送為荷」。曾校長交待校長室秘書杭立慈先生辦理此事。

業經學校公告，公開徵求本校校徽的設計圖案，到截止日期共收到八件圖案，包括有學生賴憲滄，秘書顧紹昌，……等。後經行政主管唐教務長、丁總務長、秦訓導長、文學院吳院長、勞作是楊主任、歷史系劉主任、物理系鍾主任、中文系戴主任出席、外文系柯主任共同開會討論，並投票表決。其投票結果：同意 1 號 1 人；同意 2 號 2 人；同意 3 號 1 人；同意 5 號 3 人；同意 8 號 1 人，共有 8 人參與投票。並於 3 月 12 日由杭秘書具文呈報校長：

* 東海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

交校徽圖樣遵經編號並分別徵求各主管意見如次敬請鑒察。因此，由曾校長於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用文 45(秘)字第 350 號呈報教育部，事由：呈覆本校暫定校徽樣式請鑒核。說明：一、鈞部台 45(高)字第 2516 號令飾繪製本校校徽於本月十五日前呈報奉悉。二、謹檢奉本校暫定校徽式樣一帛敬請鑒核為荷」。

三、本校校徽、校旗之設計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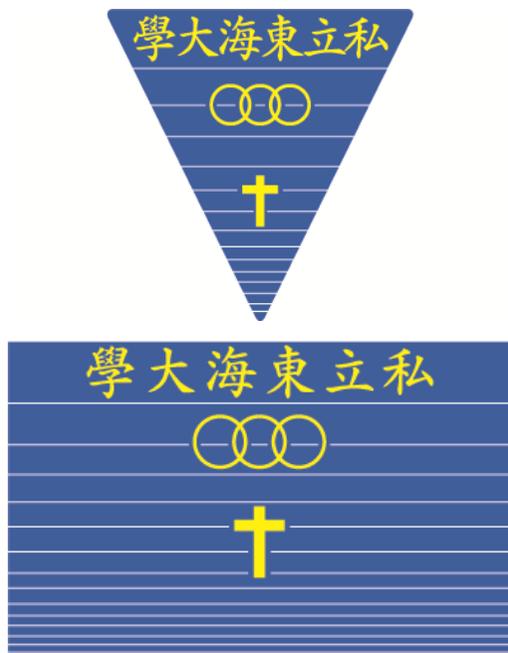
曾校長認為校徽、校旗之設計，必須慎重並周詳思考，不宜輕易決定。但因任期只有兩年，也只好暫時擱置。因此，當吳校長接任後，即慎重重新考慮本校校徽、校旗的設計。另外，再增加考慮一所學校應具有創校宗旨的校訓與校歌，這兩種也相當的重要，可以一併討論之。

因此，本校自創校至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對象徵東海精神的校訓、校徽、校旗、校歌均未決定。因茲事體大，為慎重起見，乃於四十六年底才正式成立甄選委員會，其成員包括臧啟芳(召集人)、梁容若、阿德佩、秦量周、蕭繼宗、陳兼善、陳其寬、任賜瑞及陳永森(秘書)。因先前曾校長公開徵求本校校徽的設計圖案，並未獲得學校當時參與的主管們共識。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吳校長考慮直接邀請由美國貝聿銘建築事務所派駐本校督導校園建設的陳其寬建築師來擔任負責設計本校的校徽、校旗重責大任。當時陳建築師本想回給吳校長：「我自美國來到東海是負責督導校園建設，考量自己是學建築、庭園設計的，和校徽的設計業務並沒有關係，來婉拒此項任務。」

但因當時一直沒有找到適合人選，所以後來陳建築師就接受設計了三角形校徽與校旗。由本校校名關係，有如國旗構思出藍底旭日東昇的白線條的光芒，把本校的校訓用黃色三環取連環扣掛於最上方的白線條上。經多次開會研究討論，加以修正，三角形校徽由藍、白、黃三色所組成，藍底、白線條、黃色的字樣及圖樣各有其意義，藍色象徵汪洋碧海；白色線條由窄而寬逐漸上升，象徵東海如旭日東升，至於無窮；黃色則代表中國的宗教建築顏色。三鏈環及十字均為黃色，且三鏈環沒有穿透白線條，環環相扣，三鏈環代表校訓(求真、篤信、力行)，十字則象徵基督教的崇高精神。而校旗圖案，參考三角形校徽設計發展而成。依照陳建築師構思，採用長方形、藍地、由窄而寬白線條，頂列正楷字體「私立東海大學」，用楷書比較正式，校徽也相同的加上校名，使校徽、校旗的圖案其意涵應該要有一致性。

本校終於在四十七年十月四種象徵東海精神的校訓、校徽、校旗與校歌才大功告成。首先，關於校歌決採孫克寬先生所擬者為準則，經委員修辭再

定稿，至四十七年五月一日於校刊上公布確定。其次，校訓為「求真、篤信、力行」，係據吳德耀校長與顧敦錄院長所研擬加以修訂而成。此六字校訓確為本校的最高教育理想：『因真理為體，信行為用，真本天道，行維人倫，信出於己，行及於群。群不滅己，己不篡群。三者既通，學貫天人。其英譯為："Truth, Faith, Deeds – Truth attained through Faith expressed by Deeds"』，此亦於同時間公布(見圖)。



四、教育部「反三角形」校徽的誕生

一般認為：校徽是學校師生佩戴在胸前，只是標明校名的徽章而已。其實不知道，小小校徽涵義非凡，校徽是學校辦學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藝術化展現，並反映著該校的歷史傳統與文化積累，只是現代學校刻製校徽，大都只為表明校名，而把校徽重要的涵義淡化了。你若不信，可問佩戴校徽的學生，除了證明身份外，是否會把校徽作為一種自覺的紀律，用以規範行為、警覺行動，並以此為榮？而今學生佩戴校徽大都以重點大學為榮，很少見有學生佩戴一般院校的校徽，更不用問這所學校的辦學理念、期望和願景。

中華民國的校徽，大多是反三角形、圓形、盾形……等，而共和國所見的校徽大多為橫條形。中國大陸追蹤著校徽文化的足跡，據得知上海閘北區「葉文漢校徽陳列館」，該館是中國首家校徽陳列館。此館內展出各種質材、各式形狀、各種顏色的校徽多達 6 千多枚。僅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歷年各種

樣式的校徽就有四十餘種。一枚枚五彩繽紛的校徽，既演繹出各院校的辦學理念軌跡，也是中國教育發展歷史的重要的校徽見證之一。在校徽陳列館中經細心觀察可發現，在千姿百態的校徽中，中華民國時期的校徽出現「倒三角形」樣式居多。事實上，該館負責人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至於 20 世紀 30 年代，教育部會規定反三角形校徽，要求各學校須遵行。經考究得知：中華民國時期各院校的校徽，大多採用倒三角形狀，原來這三個角分別隱含著三育「德、智、體」或三達德「知、仁、勇」的寓意。其反三角形校徽構思三育的底角是德育，而上兩角是智育與體育，因育人重視德。而此反三角校徽的寓意排列是「德、智、體」，把「德」強化到教育的首位基底。而西方的教育，由於受到基督教的影響，一般學校裡較重視智育與體育，德育則交給教會或課外活動。其反三角形校徽三達德的三個角，即是知、仁、勇。分別敘述於下：

1.教育的要旨：二育德、智；三育德、智、體；四育德、智、體、群(美)

其實「教育」一詞是古，也是新。我國原本「教」與「育」是分開來用的：「教」指「上所施，下所效」；「育」指「養子使作善」。古書中說到「教」之處甚多，例如「敬敷五教，在寬」，「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論語》裡多處談到「教」，但無一處談到「育」。《中庸》裡則多處談到「育」，「教」與「育」兩字連為「教育」一詞，始於《孟子》，但當時只是兩字個別意義之合義。至於以「教育」一詞之翻譯自西方「education」（德文的「Bildung」）一詞，則是現代用法，泛指承啟文化，使人變化氣質、開明心靈、安身立命的事業。現今在有需要簡稱時，「教育」有時作「教」，有時作「育」，前者較常用於論及教育的內容，後者較常用於論及教育的要旨。

教育的要旨，各家說法不一。先講中國。先秦教育的內容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其中「禮」屬「德育」與「群育」；「樂」屬「美育」；「射」、「御」屬「體育」，「書」、「數」屬智育。在《中庸》裡，「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者是相提並論的。《論語》上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顯然兼重智能與德性。宋朝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學規》中包括「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其中「義理」更重於「詞章」。清朝的《養正遺規》除揭櫫德性教育外，還重視生活教育，講讀書方法。

再講西方。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論教育，特別重視音樂、體操(gymnastics)、道德與知識。後來的西方，由於受到基督教的影響，一般學校

裡較重視智育與體育，而德育則交給教會。十八世紀德國的哲學家康德重視「四育」：體育(cultivation of body，包括儀態)、智育(cultivation of the mind)、群育(discretion)與德育(moral culture)。

到了現代中國，西學東漸，學者與教育家於是重新反省「育」的內涵。先是王國維重視美育，他指出：「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知育、德育、美育是也。」「三者並行……又加以身體之訓練，斯得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畢也。」清末民初的教育家注意到中國亟需圖強，都特別提倡體育。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行將擔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提倡「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世界觀、美育主義」五項主義，並主張據以為本，分配於各教科，又進一步說明：「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軍國民主義為體育，實利主義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於德育，而世界觀則統三者而一也。」後來，他更發展「以美育代宗教說」，提倡體、智、德、美四育：「所謂健全的人格，內分四育，即：體育、智育、德育與美育。」

德、智、體三育的內涵是：德主要是指思想品德和道德；智主要是指智力、智慧和智慧；體主要是指肌體、心理和社會適應能力。德、智、體三者的相互關係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實施德、智、體三育，必須堅持六條原則，即育人的整體性原則、身心發展的和諧性原則、激發學生的主體性原則、知識的內化原則、教育環境的優化原則和行為習慣的養成教育原則。張伯苓校長則提出「體、德、智三育」，指出：「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並進而不偏廢。」「德、智、體三育之中，中國人所最缺者為體育。」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20世紀50年代在教育上強調德、智、體、群四育：教育的內容是包括著智育、德育、體育和群育，這四育合起來才是健全的教育。但對校徽，教育部仍維持規定是反三角形校徽，要求各學校須遵行。

2.三達德

三達德為知、仁、勇，語出於中庸引孔子之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達」，意謂通於天下人人。「道」與「德」之分別，前者為形上的共同的法則，而後者則分散落實到各個人，乃就人而言，故修德為人道的門徑。中庸之意，謂知、仁、勇三者，乃天下人人應具之德，有此三德，然後乃能行五達道而得宜。所以具備三達德，可視為行五達道的基礎條件。

三達德之所以能行五達道，孔子在論語中曾經作過最精要的說明，他說：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見子罕篇，又憲問篇「為仁居首」。）「知」與「智」二字，今人都分別應用，知指人的認知能力，而此認知能力之所表現為智。然此二字，古人則通用，言「知」，「智」義已在其中。知者因為認知能力強，有遠見，有深識，知道人生的意義在於行道，能夠把握正道而不失，且知如何去行道，故「不惑」。仁者德合天地，秉持天地之愛心，愛人愛物，去私心之執著，存大公平等之大我心胸，如此自然隨遇而安，常保坦蕩心境，故「不憂」。勇者非逞血氣之剛，乃以道義為依歸，道義所在，殺身捨生，在所不計，也即是孟子說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上）有不惑、不憂、不懼之德，自然行道而得其宜。

知、仁、勇三達德，賴於平日修養，從工夫中得來，中庸又引孔子的話指出此一要領：「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學本身非知，而是增進知的有效途徑，能夠朝夕去學，時日既久，自然新知日增，日新又新，而成知者。力行本身非仁，但肯力行的人，都是肯犧牲奮鬥，不囿於私心小見的人，發揮此力行的精神，推己及人，由家國而天下，終於成為「與天地合其德」的仁者。知恥的本身非勇，但人如知恥，則受辱而知自強，處人下而知奮進，知恥的心理使人自生堅強的勇氣，祛除怯懦而守死善道。孔子以好學、力行、知恥三種工夫作為達成知、仁、勇的途徑，使人覺得在實際生活行事上有了遵循，有了把握。雖然，知、仁、勇的成德境界，非輕易可言，中庸將此境界歸於聖人，雲：「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按此指知德）。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按此指仁德）。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按此指勇德）。」中庸又將三達德之行，歸於一「誠」，唯天下之至誠，乃能盡此知、仁、勇之德。

五、本校反三角形校徽誕生

本校校徽則由當時吳校長，直接委請貝聿銘建築師所派駐本校督導校園建築的陳其寬先生來設計。關於校徽與校旗的圖案，甄選委員會均採用陳其寬先生所設計的反三角形校徽，後經委員會數次討論修改，終於四十七年三月三日定稿，且五月一日公布於校刊確定。而陳其寬先生也於四月出國考察，九月才回學校。最早反三角形校徽的設計，陳其寬先生是依教育部規定反三角形，其中整個圖案全由陳其寬先生獨自構思完成。此校徽係由藍、白、黃三色所組成，其藍底、白線條、黃色的字樣及圖樣各有其意，「藍色」象徵汪洋碧海（符合校名）；「白色」線條由窄而寬逐漸上升，象徵東海如『旭日東昇』，而至無窮；「黃色」的『三鏈環』原代表校訓：求真、篤信、力行，且三鏈環

採掛上白線條，環環相扣，而此三鏈環代表本校校訓具有的特殊性--**Truth attained through Faith expressed by Deeds**，而十字則象徵本校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學，具有其崇高精神。

六、本校校旗誕生

當時陳其寬先生本取中國的宗教建築顏色的『三鏈環』，而後增校名『東海大學』與基督教的『十』字也取黃色，本人在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與前工學院院長陳其寬教授的訪談中，由本人提出美國哈佛大學校徽選用純黃金顏色，其意是具有永恆不變特質，而建議改用「黃金顏色」，他已贊同採用，並選純黃金顏色 (Y100)，此特別表示這三樣(校名、校訓與基督教會大學)恰如黃金永不改變。另有關「藍色」他也特別提出，因當時在希臘眼見湛藍海洋，其美映入腦海，使本校的校徽中深藍色(C100M80)構思取自於此，而非來自天空的淡藍色。因校旗與校徽圖案雷同，故後延伸之校旗為橫幅、長方形(縱橫比為 2：3)，亦採用藍底及白線條(十四條因大陸已有十三所大學而本校是第十四所)，其排列採用反透視原理，由底至頂距離逐漸增大，頂列橫書「私立東海大學」，採正楷書體，在校名下第一線另加三鏈環，環下再加一個「十」字架，此均取用黃色。

尤其，在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訪談中，陳其寬教授特別闡述，當時在設計反三角形校徽中的白線條時，是利用「反透視」方法，而非用「透視」方法。主要特別設計出由窄而寬逐漸上升，來展現其具有如「朝陽光芒、旭日東昇」的感覺。此除了表現在校徽上外，另在東海校園建築--路思義教堂窗戶的框架及文理大道上的校友鐘樓，也有相同構思的妙處。像這些設計的構想，均在表示東海大學正如同朝起的旭日，緩緩升起，慢慢的由小到大，這也象徵東海大學具有永不止息的朝氣。的確是，陳其寬教授巧妙構思，使東海大學的校徽，深具有非常獨特的風格，真是難能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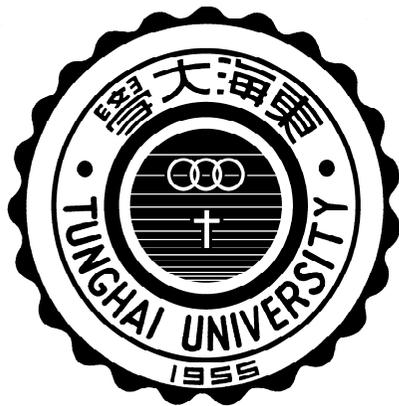
七、圓形校徽的誕生

中國多所大學的校訓，相比校訓，中國大學校訓的雷同性比例極低。因此大學校徽的雷同性總體而言也大大降低。畢竟校徽不是掛在學校門口，就是放在官網首頁，以及學校的裝潢、文件、資料……等到處都常印著呢，如果涉嫌抄襲就會很丟人。中華民國時期交通大學校長凌鴻勛曾說：「校徽所以表揚學校性質，與精神關係至重。」可見校徽是一所大學風格的集大成展現。那麼，有人研究完 920 個大學校徽，到底將會發現了啥？那我們就一個個來說：

若把 920 個大學校徽放在一起是什麼樣子？先說按顏色排列後，920 個大學校徽形成一個彩色盤：藍色調是第一大主流，紅色調第二大，接著是一部分綠色，以及一小撮的黃色、紫色及少量黑色。藍紅綠三個色系大約占了 90%。次說校徽造型，根據有限校徽的統計，圓形幾乎壟斷了大學校徽市場，大約占了 90%。由於占有率差距太大，其他的盾形、方形、三角形……的形狀在圓形校徽面前都成了「奇奇怪怪的圖案」。有人嘗試把 920 個校徽疊加在一起，變成了重疊的地方，顏色就越濃越重。你看，圓形的外框都黑得不行了，就知道多少校徽在用這個造型。為什麼圓形校徽能壟斷中國大學校徽市場？一種解釋是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審美，天圓地方嘛，四季輪迴嘛，圓滿團圓、運轉無窮……諸如此類。如果回頭看看歷史，20 世紀 30-40 年代，因教育部的規定，造成獨領風騷的校徽形態其實是倒三角形呢！這種造型在當時市場占有率非常高，20 世紀 40 年代以後相繼滅絕。但在自由中國台灣，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因教育部的規定，造成獨領風騷的校徽形態其實是倒三角形呢！不過，時至今日，這些早期大學仍有一部分在校徽中繼承了倒三角的設計，反正如果在校徽中見到倒三角，查查校史，定是波瀾壯闊。知道校徽這個葫蘆主要是圓形以後，咱們來看看葫蘆里都裝的什麼。其中之文書一篆書這個太有中國風味了！相傳篆書是傳世最早的可識之漢字，比如篆書中的甲骨文歷史都在 3000 年以上，歷史的厚重感不言而喻。920 個大學校徽中，有 104 個使用了篆書作為主要元素，各位一定很熟悉的北大、復旦校徽就是代表。將貴校標誌性精神的剪影作為校徽核心也非常常見，通常是主要教學大樓、校門、鐘樓……等。比較典型的有武漢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廣州美術學院等，不那麼典型的例如中山大學、安徽建築大學等。按這種思路構造的校徽，其獨特性有多大，基本上就取決於教學大樓的獨特性了。其實還是有很多校徽稱得上獨一無二的特殊風格：走自己的路好讓別的學校抄襲去吧。

現今使用的圓形校徽是在民國 47 年 5 月 7 日，吳德耀校長任內邀請胡適之到本校演講後而設計出來的。除了先前陳其寬教授所設計的三角形校徽是學校精神標誌外，47 年底同時所設計出的圓形校徽，也是學校另一個精神標誌。因此，當時所設計出的圓形校徽，其中心部分仍採用了陳其寬教授的三角形校徽，外加一藍色圓帶圈(123 自由日的 1)，再用中、英文校名東海大學四字選用後漢的隸書在圓形上方，而英文 TUNG HAI UNIVERSITY 在下方，構成一圓圈，外加 1955 創校年唯一圓圈，在最外層加上 23 個藍色花瓣圍成圓圈(123 自由日的 23)而完成本校的圓形校徽。下面有兩個本校的圓型校徽，

當你看久了，不知你會有什麼感覺？因本校創校時是自由中國土地上唯一的一所私立大學，1954 年 1 月 23 日在自由中國土地上誕生了世界的自由日。其詳情說明於後：



(一)《自由中國》期刊創辦前後

《自由中國》的創辦與 1949 年的政治局勢有關。經過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政權走上窮途末路。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國民黨大員和知識份子開始尋找出路。此時，時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委員、國民大會副秘書長的雷震與國民黨大員王世傑等人和胡適經常聚在一起談論時局變化，達成共識：國事壞到這種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對當局也就是國民黨的監督做得不夠，有時做了一點，但沒有力度，以致政府和軍隊快速腐敗。挽救時局的最好辦法是辦報紙和刊物，用報刊宣傳自由民主，監督政府，以爭取人心。

在辦報還是辦刊的問題上，胡適主張辦刊物，他說：「凡是宣傳一種主張，以定期刊物為佳，讀者也好保存，不像報紙一看就丟，很快就過去了。」他還主張仿效法國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將刊物名稱定為《自由中國》。雷震說幹就幹，他打算刊物就在上海創辦，開始積極籌措資金和物色幫手。他意識到此事必須取得當局特別是蔣介石的支持才好，以他與蔣介石的關係和在國民黨的地位，估計取得蔣介石的支持不成問題。1949 年 4 月 3 日，雷震、王世傑等人赴溪口看望蔣介石。蔣介石在其老宅宴請雷震一行。席間，雷震將與胡適、王世傑等人意欲籌辦一家報刊的設想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支持並願意出資贊助，他對雷震、王世傑說：「……抗戰時期，我曾就宣傳工作多次對陶希聖指示，而且還發過脾氣，但一直沒有大起色，我們這幾年在

軍事上的失敗，就與沒做好宣傳有很大的關係。……輿論宣傳很重要，你們回去就辦，經費有困難，可由政府資助。」雷震回到上海就草擬了近百人的《擬為自由中國社發起人名單》，並請胡適撰寫創刊宣言。鑒於這個宣言在《自由中國》對臺灣當局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不妨照錄如下：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我們是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說明他們早日恢復「自由」。第四，我們的最近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由此可見，《自由中國》創辦初期就是要「反共抗俄」，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會」。他們「反共抗俄」得到了臺灣當局的支持，而追求自由民主則不被蔣氏父子所容。而《自由中國》創辦兩年之後，恰恰把重點轉向了批判蔣介石當局。讓雷震始料不及的是，國民黨潰敗得如此神速，他們欲在上海創辦《自由中國》的願望隨即成為泡影。

《自由中國》雜誌最初的構想是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之前發生的。當時有一部分國民黨黨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要堅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須要有一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機關，因此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等人，研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但不久後中華民國政府暫退台灣，《自由中國》雜誌無法在大陸地區發行。1949年10月，雷震到達臺灣，隨即召開會議，著手在臺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會上，確定由胡適擔任《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任社長。胡適在美期間，雷震負責一切法定責任，遂於1949年11月在台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總編輯為毛子水，副總編輯為王聿修，總經理馬之馬肅。《自由中國》後來的命運證明，胡適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胡適是雜誌的保護傘，雷震是雜誌的火車頭。這是雜誌社其他人員對他倆的評價。

(1)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

《自由中國》在創刊初期，由胡適擔任發行人。編輯委員會共有17人，是人數最多的時期，也是思想最複雜的時期。創刊初期的《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三種思想路線：第一是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為首的「三民主義」的思路；第三是所謂少壯派的「唯我主義」的思路。

(2)《自由中國》的宗旨

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制，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忍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3) 《自由中國》的創刊詞

在這個時候，我們用「自由中國」這個名字出版一種刊物，讀者顧名思義，當可油然而生同情心。但為鄭重起見，我們謹把我們的旨趣，簡單的述於卷首。

「自由中國」，是我們現在中華民國的同胞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際上所應當以為政生活的目的的。一個民族生活在現在世界上，如果沒有較合理的政治生活，便不能有其他的好生活；如果沒有一個自由的國家能夠保證他們的自由和安全，他們必不能有一個合理的政治生活，他們必不能在人類進步上有什麼貢獻。

一個自由的國家，和無政府的社會不同；無政府的社會，只能由混亂而趨於毀敗，必難給予人民一個好生活。一個自由的國家，和極權的國家不同；一個極權的國家，非特不能給人民以自由，並且也不以能給人民以安全。一個自由的國家，更不能做任何其他國家的附庸。

而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一大半土地現為共產黨軍隊所佔領，一大半同胞已喘息於共產黨的恐怖中。他們非特沒有自由和安全可言，他們簡直沒有國家可言。

共產主義的政府，和法西斯主義的政府，是現代極權政治兩種不同的形式。在這種政治下人民不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這是極權政治的理論和事

實所必使然的。最壞的是，這種政府的主持者，為領導欲所驅使，完全拘牽於這種政治的形式，更沒有機會想到人民實際的利益。他們看人民和機器一般；無論什麼無人性的殘忍事情，他們都做得出來。結果，人民所受的痛苦，便不是常識所可臆度的了。

共產黨兵力所到的地方，即蘇俄勢力所到的地方。在中共諸人，固然以為大功將成，不久便可以向莫斯科獻捷了。而自中華民國人民的立場言，則萬一中共竟席捲中國，則從此以後，中華民國的同胞，將都淪為蘇俄的奴隸；非特成為沒有自由的人民，並且成為沒有國家的人民。

我們並不反對世界各民族在自由和平等的原則下，成為一家的主張，但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陰謀，反對極權，反對殘。蘇俄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中國，我們同胞所受的痛苦，必不是過去在任何暴君壓制下的痛苦所可比擬，在任何外族管轄下的痛苦所可彷彿。三百年前，幾個無賴的斯拉夫人開始過烏拉山，遂啟沙但東侵的野心。從此以後，俄人便沒有一天不想染指於中華國土。現在蘇俄的統治者，完全承襲沙皇的傳統，而又加強奸詐詭譎的技術。百年以前，林則徐說過：「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在現在講起來，俄羅斯不只是中國的「患」；實在，在現在世界上，為永久和平的障礙的，只有一個俄羅斯！蘇俄如不改變他的政治方式，不改變他的政治手段，世界將永遠沒有和平的一天；蘇俄如併吞世界，世界便變成黑暗時代，全世界上的人民，除卻蘇俄統治階級以外，亦必沒有快樂的一天。

這是我們反共抗俄的極明顯而不可易的理由。我們若不認識這一點道理，不是大愚，便是大惑。我們如認識這一點道理而不去想法阻止蘇俄的侵略和中共的暴行，不是頑夫便是懦夫。

「自由中國」這個刊物，正是要闡明蘇俄對於世界--尤其是對於中國--的禍害，和中共對於國家和人民的罪惡。我們並要討論如何阻止這個禍害，如何洗滌這些罪惡。這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本著思想自由的原則，意見不必盡同，但棄黑暗而趨光明，斥極權而信民主，求國家民族的自由，求世界的和平，則是大家共同的主張。我們說話的態度，可在下列少數誠條中看出：

A. 不作無聊的悲觀

歷史的路程，雖然有迂迴曲折，而大流所歸，都是表明人類是趨向開明的。現在蘇俄的行為，不過歷史人類進程的逆流之一；當然，他的範圍和力量比任何過去人類進程的逆流都要大。但我們相信，人類行為的總結總是趨向於善的。我國二千年前儒家的大師荀況有言：「狂生者，不須時而落。」當

代英國大哲學家羅素亦以為「狂妄者定必失敗」。在一方面講，這種逆流的範圍和力量愈大，我們要挽正他當然更要費勁；在另一方面講，我們在這個時代，我們為善的機會亦最多而最大。況且「歷史是在我們這邊的」！我們並且相信，中華民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善良文化的陶冶，善的力量，比惡的力量多。一旦明瞭中共主張的錯誤，中共宣傳的虛偽，定必毅然決然，衝破中共的蒙蔽。所以現在的時局，雖是陰霾，但我們總有見到光明的一天，不必作無聊的悲觀。

B. 不作下流的漫罵

「政者，正也」。我們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出版這個刊物，我們最大的目的，是要把我們平易而正確的見解，仔仔細細的告訴我們的同胞。我們居心當然要「出於正」，我們在說話上邊亦不可不「出於正」。所以我們屏除一切下流的漫罵。我們說話的對像，當然包括被中共宣傳所麻醉的同胞。但是這些人裡面，我們也相信盡有許多可與為善的人，這班可與為善的人我們只要好好提醒他們，便可恍然大悟，棄邪歸正，用不著罵；至於不可與為善的人，終身不靈，罵有什麼用處？

C. 不歪曲事實

我們如果述說事實以作例證時，無論是歷史上的事實或現在的事實，我們都求十分的正確。我們決不為一時說話的便利而歪曲事實。我們相信：正確的判斷，須基於正確的事實。我們所要向世人傳達的，決不是花言巧語，而是正確的判斷；所以我們萬不可歪曲事實。我們述說自由中國地域中的情形，我們固然絲毫不加粉飾；我們講到中共區內的狀況，我們亦必盡量求其實在。真實是我們生活的一種目的，亦是我們這個刊物的一種目的。

D. 不顧小己的利害

我們以最誠摯的心腸向世人說話；我們說話的目的，決不是為一黨一派的利益。我們所要申明的是人道和正義；我們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說話，為同胞的自由和安全而說話。在這個時候，我們有應當說的話，如果因為有所顧忌而不說，或隱約模稜的說，都犯著『見義不為』的過失。我們所要仔細辨別的，是我們說話對社會的影響，而不是對一己的利害。我們的話如果有幾分好處，如果可以導人為善，則無對我們自身有什麼危險，都是值得我們去說的。

最後，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態度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我們主張一切合理的改革，以求對於人民生活有實際的利益和進步。我們非特要堅守現在

仍是自由的國土，我們也要竭力抵抗蘇俄侵略中國的暴力，不讓共產黨的極權政治，仍在中華國土立足。我們希望用這種態度和主張博得全國同胞的贊助！

(二)世界自由日

(1)「世界自由日」的由來

要追溯到韓戰時期。1950年6月韓戰爆發，被聯合國軍俘虜及陣前易幟的軍人共17萬3700人，其中2萬1400人為中國共產黨人民志願軍。中國、聯合國軍達成協議，讓戰俘決定自己的去向，而由中立國印度等國代表負責鑑定。最後共有14,235名戰俘選擇前往台灣，而選擇返回大陸的戰俘大多受到政治審查、被開除共產黨籍等。

1954年1月4日聯合國軍統帥赫爾將軍(John E. Hull)為表明人道與正義立場再鄭重聲明，請印度代表齊瑪雅必須於1月12日將全體反共戰俘無條件釋放。前往台灣的戰俘於1954年1月23日由基隆上岸抵台，受到民眾熱烈歡迎，並被稱為「反共義士」，當天全台灣各大城市自由鐘都敲響23下。中華民國政府將這一天訂為「123自由日」，紀念這個「從中共手中解救大陸同胞」的事件¹；並在泰國曼谷舉行「第一屆世界反共聯盟大會」，並籲請全世界反共陣營的國家共同響應。

隨冷戰氣氛轉淡、兩岸局勢日趨穩定，各共產主義國家政權在二十世紀末逐一崩解，1993年將「123自由日」改名為「世界自由日」。

世界自由日，舊稱123自由日，定於1月23日，源於中華民國紀念1954年1月23日韓戰反共戰俘獲釋、具有反共意義的政治性節慶，1993年改為現名。

(2)123自由日的背景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開始。10月，中國共產黨人民志願軍30多萬人參與韓戰，全線反撲，聯合國軍被迫後撤退。11月26日，志願軍參與韓戰。12月，聯合國軍自平壤敗退。1951年10月，韓境停戰談判於板門店舉行。

¹ 根據公民課本的記載，民國43年1月23日，一群「反共義士」被「共匪」強徵去打韓戰，結果被聯軍俘虜後準備強制送返共匪統治的中國，讓這群「反共義士」非常生氣，就在集中營鑄造大刀，並用血染製作國旗，準備在共匪接收時拚命。這群「反共義士」的決心感動了聯軍，所以最後依他們的心願送到台灣。課本內文最後還強調，「這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一二三紀念日，又稱自由日，是正義戰勝強暴，自由打敗黑暗的偉大日子」。課本最後附上的註解信條還寫著，要效法反共義士正義不屈的精神，堅決反對共匪。

中共方面一直堅持要求聯合國軍無條件遣返所有戰俘，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回到中共統治下；中共立場被聯合國軍所拒絕。1952 年 2 月，韓境聯軍總部堅持「自願遣返」戰俘原則，蓋聯軍在韓境所獲 17 萬餘戰俘中，有 10 萬人不願被遣返，尤其在 2 萬餘名華籍戰俘中，誓死不願遣返者達 1 萬 6 千名。韓戰期間聯合國軍俘獲戰俘及在陣前易幟之軍人共 173,700 人，其中中國共產黨人民志願軍有 21,300 人被俘，被俘人員中連排級軍官有 600 人左右、營級 30 餘人、團級 5 人、師級 1 人，主要被關押在巨濟島等地。

1953 年 6 月，韓國釜山戰俘營 1 萬 4 千 2 百餘名華籍反共戰俘上書，請求釋放，並准其到台灣參加中華民國國軍行列。雙方最後達成協議，戰俘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去向，戰俘的意向由中立國印度等五國的代表負責鑑定。

中共官方認為，表面上看，戰俘由印度主持對戰俘進行了甄別，以確定其本人的意願。實際上，聯合國軍停戰談判代表團首任團長喬埃提出「自願遣返」的方案，試圖用「大量朝中戰俘拒絕被遣返」的結果來宣揚「共產主義的失敗」。共產黨志願軍戰俘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於國共內戰中被俘，從而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中華民國國軍士兵，這一類戰俘中有不少人不願意在停戰後回到中國大陸。最終共有 14,235 名志願軍戰俘選擇前往台灣，而選擇回大陸的戰俘大多受到政治審查、被開除共產黨/團籍或拒絕其入黨。組織幹事韓子建後來提出重新入黨(他在濟州島是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組織者之一)被別人要求重新念一遍在歸管處寫下的交待材料去評定是否夠格入黨，他無話可說，之後就自殺了。



1954 年 1 月 23 日，牛哥祝賀 123 自由日的漫畫

中華民國政府及海內外 448 個民眾團體，為歡迎「反共義士」來歸，經過多次集會商討，事先向聯軍統帥呼籲，務須如期終止監管。1954 年 1 月 4 日，聯合國軍統帥赫爾將軍，為「表明人道與正義立場」再鄭重聲明，請負責戰俘事宜的印度代表蒂邁雅必須於 1 月 24 日午夜將全體反共戰俘無條件釋放。1 月 23 日清晨 7 時 20 分起，14,850 名中國反共戰俘、7,650 名韓國反共

戰俘，終於奔向南方，得到釋放。前往台灣的反共戰俘分成三批，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由基隆上岸抵台，接受全台灣民眾的熱烈歡迎，被稱為「韓戰義士」。他們在臺北市遊行，市民張燈結綵表示慶祝。全台灣各大城市自由鐘，都敲響 23 下。並定 1 月 23 日為自由日，以紀念「反共義士」重獲自由。一面通電全世界民主國家，籲請一致響應。此後每年集會慶祝，並有全世界熱愛自由、主持正義人士來台參加盛會。



中華民國政府特設「123 自由日」以紀念這個「從中共手中解救大陸同胞」的事件；其後並在泰國曼谷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反共聯盟大會」中通過。這即是 123 自由日的由來。這些反共戰俘來到台灣之後，都被編入中華民國國軍、並參加了諸如 823 砲戰的戰役，大多終老眷村。

隨著冷戰氣氛轉淡、以及兩岸局勢的穩定，中華民國政府終止動員戡亂，各共產主義國家政權也於 20 世紀末逐一崩解，此紀念日於 1993 年改名為世界自由日。後來有的台灣戰俘經商致富後回大陸投資，受到當地政府熱情接待，如戰俘張城垣就曾見到這種場面。

(二)本校圓形校徽之緣由

本校圓形校徽的演化過程，主要是考慮到國內外的校徽的造型大都為圓形，雖然教育部規定是反三角形校徽，但由於先前中國大陸 13 所基督教會大學的校徽都是採用圓形校徽，恰好吳校長於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七日特別邀請

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來校演講，題目是『胡博士談話要點--談談大學』，其中又再提及自由寶島—台灣的東海大學，希望東海能把握「自由獨立傳統的好榜樣」。同時也呼應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教育部程天放部長在本校創校的動土典禮上所說『本校是在自由中國土地上，唯一的一所基督教大學』。



校旗取圓部

設計自由日 1-23

校名圈及年代圈

本校圓形校徽

因此，本校當時不僅重視全國上下正在歡欣鼓舞的慶祝一二三自由日，而且本校更重視是在自由中國土地上首創的第一所基督教大學。特別把珍惜自由的精神烙印在本校的校徽中，本來的校徽形式原為反三角形，後增改為圓形，設計加入「1-23 自由日」的象徵圖案。先增加一個藍色粗圓條，其中中心除保有原校旗設計的特質外，取圓形部分，另增加中、英文校名及創校年代，也為藍色，但中文名仍保留原校旗設計的黃色，以及最外增加一個藍色圓圈還鑲有 23 個花瓣邊，亦均為藍色，此特別代表展現出「1-23 自由日」的「自由」精神，這可說是與「自由中國土地上，唯一的一所基督教大學」相互呼應。另特別的是因胡院長述及『我國第一個的太學，就是在漢武帝時期』，而使圓形校徽中的中文校名，甄選委員會，其成員之一中文系蕭繼宗教授專長各體文的習作，於圓形校徽中採用漢代鼎盛的隸書²的創新藝術字體³，才具有如此的完美的圓形校徽，並於 1958 年秋天完成，而後教務處製成圓形鋼印，壓印於中、英文成績單上。事實上，創校時的學校信紙及聘書上的中文校名就是採用隸書字體，後來 1959 年有了監察院于右任院長的墨寶，才改用草書

² 隸書為秦書八體之一，是漢字中常見的一種莊重的字體風格，書寫效果略微寬扁，橫畫長而直畫短，呈長方形狀，講究「蠶頭雁尾」、「一波三折」。隸書起源於秦朝，相傳由程邈整理而成，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隸變，又稱為隸定，是漢字由小篆演變為隸書的過程，大約發生在秦漢之間，是漢字發展的轉折點，對後世的漢字有很大的影響。中國文字在小篆以前仍然遵從「六書」造字原則，漢隸則不再遵守「六書」原則，自行變化造形。現代的楷書和行書寫法絕大部份和隸變之後相差不遠。

³ 西漢初期仍然沿用秦隸的風格，到新莽時期開始產生重大的變化，產生了點畫的波尾的寫法。到東漢時期，隸書產生了眾多風格，並留下大量石刻。

字體。



誌謝：特別感謝圖書館謝鶯興組員的協助、關心與資料提供。

主要參考資料

- 1.《東海大學校史(民國 44 年~69 年)》，東海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輯，台中：東海大學，1970 年。
- 2.《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特刊》，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台中：東海大學，1995 年。
- 3.《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1955~2005)》，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4.《東海大學六十年校史(1955~2015)》，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5.《東海大學校刊》，第 9 期至 13 期，東海大學校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1958 年。
- 6.《自由中國》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主編，台北：自由中國社，1949 年。
- 7.陳建中著《教育與文化》周刊，第 6 卷第 4 期，頁 31-33，1955 年。
- 8.〈本校校徽校旗設計情形說明〉報告，東海大學行政會議，2002 年 10 月 16 日
- 9.東海大學圖書館「虛擬校史館」資料庫，台中：東海大學。
- 10.有關「自由中國」的網站及有關「123 自由日」的網站。